校 史 研 究

千年传承,斯文在兹
——兼谈北大的隐性传统

何 怀 宏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一种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人文理性传统在殷周之际产生,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周文”。它在春秋战国孔子及儒家那里发扬光大,在汉代落实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主干。但它也一直伴随着困厄,常常是在种种困难中前行与发展,近代以来则更遇到极大的挑战。而其精神和文脉在支持它的社会政治体制崩溃之后,是否还能在现代大学的体制内延续和生长,是一个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人文;大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G 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2-0154-07

王国维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是一个初令我们觉得意外却值得深长思之的命题。我们一般会同意,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大规模遭遇和冲突,从而追求富强,进行革命,直到改革开放,和世界连为一体,走向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亘古未有之巨变”。而上溯历史,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百家争鸣、诸国争雄,直到“书同文,车同轨”,走向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则是在华夏本土发生的更早的一次、虽然重要意义可能稍逊的一次巨变。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何以为中国”的特殊性,或许还可以说,西周至春秋封建诸侯时代的中国已经是相当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的中国了。而这种特殊性看来正是在殷周之际形成的,正是在周人代商之后,中国走向了一条与世界其他文明国家迥然有别的道路。也就是说,殷周之际的确也还是一次如王国维所说的剧烈“变革”。这样经过殷周之际、春秋战国和近现代三次巨变,或许可以说形成了三种既连贯又有差别的中国形态,即“古典中国”(Classic China)、“传统中国”(Traditional China)与“现代中国”(Modern China)。而我们今天或许还处在这最后一种的转型过程之中。

王国维用“尊尊、亲亲、贤贤”解释这种周人变革的这种特殊性,将所有阶层合为一个亲亲之道德团体,不仅文质彬彬,而且温情脉脉,君主天定,提供社会稳定;“贤贤”人为,提供政治活力。但本文不在这里详细讨论这种中国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探讨周人所开启的这一特殊道路之精神与文脉的大略变迁,尤其是强调其在困厄中前行的特点,以及它在近代以来遇到的大困厄和可能的延续。

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记载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①孔子先人是宋国贵族,是殷人的后裔,然而,他最崇尚和遵从的却是周代文化。他

收稿日期:2017-09-20

作者简介:何怀宏,男,江西樟树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礼记· 中庸》记载了孔子另一句“吾从周”的话:“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论语》中并有言:“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朱熹解释周文之“文”说,“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见《论语集注》。但本文倾向于用“周文”而非“周礼”来概括周的变革要义。“周礼”更强调约束,而“周文”更显示生气勃勃的一面,表现一种“文盛貌”。说“周文”也可体现后来周人的有些精神意蕴如“亲亲”虽然本身不再政治制度化(封建),但却可以成为指导制度的精神和社会伦常,乃至于到今日亦是需要保留的文化传统。

还有言如“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卫公孙朝曾问于子贡:“仲尼焉学?”子贡回答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①

周人有鉴于商亡的历史教训,不再以天命在身而自信,将眼光从天上拉回人间,强调人事,以德配天,商人文献中多见“帝”“上帝”字样,而在周人那里,“上帝”则开始隐退,虽然他们并不完全拒绝宗教的因素,但并无对一个超越存在的唯一神的绝对信仰,而是更加强调人事、学问和德行。“周虽旧邦,其命惟新”②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由尚武转为崇文,注重礼乐,也就是说,中国从那时起就开始强调人文理性与文治,如梁漱溟、钱穆等学者所认为的是一个人文理性早熟的国家。这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所走的信仰上帝、政教合一和崇尚武力、不甚留意文化修养的道路很不一样。流风所积,我们到《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还能够看到贵族们重视礼仪,吟诗观乐的盛景。

我现在想说明的是,周人这一剧变求新也是在困厄中形成,是由时势逼迫出来的。周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旧邦,但力量开始还是较小,到商纣王时期,后被谥为“文王”的姬昌立为邦主,是为西伯,他“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后被崇侯虎谮言于殷纣王,被囚于羑里约七年之久。韩愈的《拘幽操》(又名《羑里操》)诗云:

>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
> 耳肃肃兮,听不闻声。
> 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
> 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
> 呜呼! 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这首诗是韩愈仿照文王的口气写的,它是韩愈一组很特别的诗中的一首,在这组名为《琴操》的十首诗里,韩愈设想孔子、周公、文王、古公亶父、尹伯奇、曾子等人的一些困厄的处境,来体会和抒发他们的心声。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最易被今人诟病,但我们可以设想这是进入了一种精神状态或心境,这种状态类似于苏格拉底在狱中仍然要遵守不公正地判处他死刑的法律的精神状态,类似于《圣经》中所言“无限忍耐、无限顺从”的精神状态。它实际是忠于一种原则而非个人。

在这种孤独被囚、看不见日月星辰的困厄中自然会有深深的忧伤,就像《周易·系辞》的作者所揣想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但对有的人来说,这孤独的时刻、忧伤的时刻,同时也是一个凝神的时刻,一个创造的时刻,四周黑暗但内心光明。“明夷”一卦可能最适合解释文王的处境和心态。《象》对明夷一卦的解释是:“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而司马迁更明白地说:“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③据说正是文王将伏羲创制的八卦演为六十四卦,从他后来的施政看,他也一定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政治有过深刻的反省,对未来的规划有过深远的谋划。

但即便有深谋远虑、光明通达的观念,如果没有接续的优异卓绝者继续贯彻,乃至还要加上一定的时代运会,这些观念也不一定能够实现。而在文王之后,却有其子武王两次会盟诸侯,终于克商。武王克商之后不久即病死,天下初定,其子尚幼,形势危险,又有其弟周公顶住舆论压力代摄政事,讨伐叛乱,分封诸侯,制定礼仪,并撰写多篇政诰,“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谆谆告诫统治阶层要慎修德行,节制克己。他又作《周礼》,兴正礼乐,改善制度,使社会稳定,人们和睦。周公对“周文”的贡献实多,他既是一个贯彻者,又是一个设计者,

---

① 以上皆引自《论语》。

②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朱熹解释说:“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见《大学集注》。

③ 司马迁:《报任安书》。

还是一个德行最为人崇敬的人。

二、在困厄中创造与前行

前面讲到了"周文"在困厄中的诞生。现在讲它在传统社会历史中的前行。即便是在古代,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些个人也不无困厄——但总的历史趋势是朝着他们推进的方向。而在现代潮流的冲击下,"周文"则是"岌岌乎危也",时代已经在朝着另一个方向疾速发展。

对"周文"在礼崩乐坏、烽烟四起的时代里保持薪火和发扬广大,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起了最大的作用。但孔子个人及其弟子的从政活动,却陷入过种种困境。孔子在五十以后的周游列国期间,在匡地被拘禁五天,匡人并有加害之意,弟子们害怕了,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去宋国的时候,他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去郑国的时候,孔子与弟子走失了,被郑人讥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又有一次在陈、蔡之间的时候,两国大夫派人"围孔子于野",不让走,乃至于绝粮,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在十四年颠簸流离之后,回到鲁国。他十五岁就"有志于学",一边做如"委吏""乘田"之类小吏,一边好学不倦,三十岁后则辞仕而专一讲学。他招收的学生不限国别,不限出身和阶层,"有教无类",实际已经在民间教育上打破了世袭士大夫的贵族传统,且将尚武之士彻底转变成了崇文之士。儒家也提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这就意味着也要在政治上打破世袭。回国后,他就完全专注于文化学术的工作了,和弟子们一起搜集和整理诗经、尚书和周易等古代经典,使这些经典既是华夏文化的共同经典,又成为儒家的特有经典。当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经过他的搜集和整理,"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并自撰微言大义的《春秋》。孔子一生以诗书礼乐教,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的贤人七十二。这已经俨然是当时一所民间的大学。

孔子不仅是"周文"一个最伟大的传承者,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发扬光大者,一个根据时代形势而变通的创造者。再有德的王朝也会衰朽,也会崩溃,也会被取代;而一旦其中有富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文化价值,却可以影响长久。除了打破世袭,孔子还阐发了"礼"之后的"仁","文"之后的"道"。而他对西周三圣,尤其是文王、周公始终尊崇,甚至到了日思夜梦的地步,和他们心灵相通。他经常梦见周公,又曾向师襄子学一首琴曲,先是得其曲,接着得其数,再后得其志,最后得其为人,他在数十日反复练习和揣摩这首曲子之后说:"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我的老师说这首曲子正是《文王操》)。"①

孔子又是一位伟大的平衡者,在他的思想里,不仅有承前启后的平衡,也有内圣外王的平衡。继承他思想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就分别有孟子的心性之学与荀子的制度之学;其后两千多年,先是在外王层面有从董仲舒到韩愈的努力,至唐朝各项基本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已大致框定;而在内圣层面则有从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不同进路的发展,到宋明已臻其高峰。

秦朝用强大的武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郡县制,但它的指导思想还是严酷的法家思想,它也还没有解决君主之下的统治阶层如何再生产等重大体制问题。汉初则一度以黄老思想为主导,比较清静无为,使民休养生息。但道家思想对于个人精英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修养,在政治上还难于成为一种长治久安之道。作为两者之间的某种中道的儒家学术和思想,在经过了漫长的战乱与秦火,又在汉初的朝野积蓄了相当的文教力量之后,终于成为历史的选择。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儒者董仲舒以贤良对三策,他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也主要有三条:

第一是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可以长治久安的统治思想的问题。但这一"独尊"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即不让百家思想

① 《史记·孔子世家》。

可以在政治上“并进”，但还是允许百家思想可以在民间社会“共存”，这也是后来的历史所印证了的。

第二，董仲舒提出了开日后两千多年选举制度先河的“察举”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将“特举”变成了“岁举”，即变成了固定的、定期的、日后连皇帝也不能轻易改动的制度。

第三，董仲舒还提出“兴太学”的建议：“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这一岁举和养士的制度开始似乎只是一个分量不重的政策，但随着它的日益有效，随着它的使机会平等、人尽其才的道德正当性的日益充分显露，它的分量也越来越重，最后成为不仅改变了政治基本结构，而且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制度。中国传统社会虽然还是一个等级社会，但却是一个上下流动、权力开放的等级社会。

元朔五年（前 124），董仲舒建议的“兴太学”终于出台。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之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掌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制曰：“可。”这就是“太学”的开始，正如马端临所指出的：“前此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是，官始为置弟子员，即武帝所谓兴太学也。”①自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中国决定性地走上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它更重视文治而非武功，更依赖德行与学问而非血统与暴力。它是以和平的途径、而且是以文化修养为标准来解决权力延续和更迭的问题，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古代文明要么权力世袭，要么为解决世袭问题的粗暴甚至怪诞的强制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②

故此，我们也可以说，“周文”经过周代数百年的发展，更通过孔子及儒家的发扬光大，最后在制度上基本落实于“汉制”。“汉制”是“周文”与“秦制”的一种结合，它在原先的制度上吸纳了“周文”，使之成为一种政治精神和灵魂性的东西。此后两千多年，虽然还有分裂时代，国家大小，但基本的制度形态是“皆汉制也”而非“秦制”。

但是，董仲舒的个人命运并不是那样顺畅，甚至也可以说是历经困厄。董仲舒自幼好学，后又勤勉讲学，他曾“三年不窥园”而专心学问，也曾以解释灾异的方式警示最高统治者，以致被“下吏”，差点处以死刑，他又两事骄横的诸侯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直到他“恐久获罪”而“病免”。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他没有做过高官。但这也就够了。学者可以“功成不必在我”，这也符合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

韩愈是在唐朝起而捍卫本土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一个文学大师，他在《原道》等文中有的排斥佛老的观点看来过于激烈，但这主要还是因为在政治上作为最高权力者的皇帝“遣使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拜”所致，即他认为这损害到了儒家或者说“周文”的作为政治主导思想的根基。所以他上表反对，结果宪宗大怒，“将抵以死”，后来经大臣缓解，乃贬潮州刺史。韩愈被认为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导者，也可以说是在文学上重新振兴“周文”之“文以载道”的方面。他曾任国子监祭酒，撰写《师说》，认为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但他并不认为这“道”是为一些人所垄断的，而是“无贵无贱，无长无小”，“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

① 《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一。

② 如从公元 9 世纪起在埃及穆斯林王朝就开始成形，实行了数百年之久的马穆鲁克制度，这种制度是将从其他地方抢掠而来的幼童选择给予良好的教育，长大后由他们作为日常治理的统治者和军队的指挥官，但他们的身份始终还是奴隶，他们的特权不能够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只具有单世代性。新的统治者将是新的抢掠而来、培养长大的奴隶。参见芬纳《统治史》卷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0、134—140 页。

他在《进学解》也写到,无论才能大小,都应使其“各得其宜”,各种人才也应“俱收并蓄”。

宋朝对士大夫是最为礼遇的一个朝代。但朱熹的个人命运也不是顺畅的,尤其晚年受到压制和迫害,其学被朝廷斥为“伪学”,其人等同禁锢。甚至有“选人余嘉至上书乞斩熹”。朱熹不以富贵为意,多次辞官,专心研学讲学,“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他“家故贫”,后来也常常是“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其《大学》《语》《孟》《中庸》四书集注的确精粹,至死前都反复修改不已,后终被列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士人。

王阳明所遇的明朝则是一个“君益尊,臣益卑”的朝代,他在早年就因宦官刘瑾擅权,抗章救同仁结果被“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那时龙场还是荒蛮之地,瘴气盛行,曾经有一日他见到主仆两人都丧生。但就在这艰困的环境中,他“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建立了儒家心学的思想体系,此后“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其讲学吸引了大批士子。而他又是儒家中的豪放者,不仅能读书讲学,也能带兵打胜仗,曾“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后人总结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①

以上四人都曾累遭困厄,甚至于都受到过死亡的威胁,差点被处死,被杖死,被瘐死。但却都在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学术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传承和发展了“周文”的学脉和文脉。

三、现代大学与中国传统

中国的传统政治一向重文,士非武士而是文士,国家主要以文臣治国,文臣地位远高于武将,长此以往,虽然在经济和文化上有很大繁荣,但的确在武力方面还是容易使国家比较文弱,这在一个以力竞争的世界尤其不利。中国不仅在近代西方列强进犯时节节败退,其实在之前就已屡遭北方部族打败乃至征服。而到了近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就还不仅仅是武力的进入,西方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也进入中国,和武力结合在一起对中国传统造成莫大的威胁。早在 19 世纪中期,太平军兴起,曾国藩就已有不仅“亡国”“亡王朝”之感,更有“亡天下”之感。所以,他在《讨粤匪檄》不仅指斥其“荼毒生灵”,还痛陈其“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但这一事变比起后来的事变,则可能还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要图富强,不得不在 1905 年废除科举。士人以文化为进阶,进而获得在权力、财富和名望的“三位一体”的延续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连接不再起作用。在教育方面,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大学。蔡元培在 1917 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中告诫学生要“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希望学生放弃进大学不要再抱有“做官发财思想”,但他既看到了时代的变革,又保留了历史的传承。他一方面指出现代的大学不再是过去的太学和科举了,需要中止文化素养与政治官职的直接联系,而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人文与学问的统续不能断绝。现代大学应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宗旨。但是,现代中国的大学发展到今天,与蔡元培的时代又有很大不同了。迨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香港还只有一所香港大学,台湾也只有一所台湾大学,而内地的国立大学,教会大学也为数不多,而现在的大学院校已经是多如牛毛。过去“学成任事”的专门学校也都成为大学了,乃至于成为大学的多数甚或主流。现代大学的学问领域是广博的,乃至变得非常实用,与社会和市场紧密接轨,要为多种多样的社会职业育才,许多学科不再求“高深”而是求“实用”,与政治入仕的关系不再像中国传统社会那样紧密,但与经济与市场的需求则密切相关。今天大多数高等院校的主要目标已经

① 《明史·王守仁传》。

不再是培养“高深学问”的研究者和教学者了,而是在“海纳百川”的各个学科领域中培养各类实际人才。

传统的中国士人文化可以说在现代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困厄,甚至大树倾摇,花果飘零。虽然还有一些有志传承和复兴者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往往还是只能坚持一段时间,最终还是不得不汇入时代的大潮。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初,钱穆、唐君毅等人在香港始创新亚书院时,学校条件艰难,主要的办公室只能放下一张长桌,学生往往只能在学校天台上露宿,或者蜷卧楼梯之上。老师也常常是睡地板,低薪缓发乃至义务教授。但当时还是有一种活跃的传统书院的人文精神。如“新亚校歌”所言:“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他们旨在“为中国文化续命”,“为文化故国招魂”,就像钱穆在新亚书院成立十周年时以《珍重我们的教育宗旨》为题的演讲所说,“中国文化有其五千年的悠长传统,必有其内在宝贵之价值。我们该使中国青年懂得爱护此传统,懂得了解此传统之内在价值而能继续加以发扬与光大”。书院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文人才。但新亚书院最后还是在 60 年代与其他几所书院并建香港中文大学,70 年代又经历改制,说明今天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已经很难在现代大学体制之外开展和进行。当然,今天的大学也必须要有比传统文化更开放的胸襟,有“兼容并包”的心态吸纳各方活水。不仅道家玄学原就是本土的学问,佛学也早已融入中国的文化,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更须学习和思考世界上其他诸种文明、文化的学问,包括接纳迅猛推进的经济与科技文化。

江弱水在一篇《为文化续命,为中国招魂:关于新亚书院》的文章中写道:“新亚书院虽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但从很大程度上讲,其学风乃是北大传统的延伸。陈万雄先生曾向我列数,钱穆是北大旧人,王德昭、全汉升等都从北大毕业,牟宗三也是从京华出来。因此,说新亚其实就是将北大浓烈的学术风气、深厚的文化底子带到南方来,也未尝不可。”①这就要谈到北大的传统或文化传承了。如果考虑到文化超越王朝乃至时代的性质特点,从京师大学堂而来的北京大学的校史是有理由和资格接上传统太学的历史的,但不接上也没什么,这是一个时代的选择,而关键的还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

在我看来,北大或许可以说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从现代建制来看的“显性传统”,那就是我们现在纪念的,从 1898 年建立京师大学堂以来的北大传统,我们也可以称它是“百年传统”。对这一“百年传统”的要素多有学者论述:“启蒙”“爱国”“科学”“民主”“革命”等,皆之谓也。

而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北大还有一种“隐性传统”或“千年传统”,这就是一种士人的传统,一种文化的传统。将它视为北大的一种传统,是由北大的历史、地位以及精神品味决定的,从历史渊源和文化地位来说,北大是最有资格接续这一传统的。从渊源来说,京师大学堂可以追溯到两千一百多年前的西汉;从地位来说,北大也是中国进入现代大学体制以来百年中最好的、文科最强的大学,它也吸引了众多的优秀文科学生和老师;从精神品味来说,虽然时强时弱,百多年来的北大师生基本上也还保持了这样一种传统,薪火相传不断。

一所大学或可以说主要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吸引与容纳功能,一种是培养与熏陶功能。当然,这两种功能又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愈是培养和熏陶功能强的大学愈能吸引到好的学生,而愈是吸引到好的学生,也就有愈多可造的优秀之材。而北大在这两方面可以说都是得天独厚的。作为在两种“传统”意义上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悠久大学,北大能够吸引中国最优秀的学子,尤其是文科学子;而它也有它多年来形成的特有的浓厚学术氛围和传统,优秀的学子也能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熏陶和培养。虽然在有的时候,培养功能很强,有的时候较弱,但吸引功能始终是起作用的。

近百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内忧外患、泥沙俱下,甚至斯文扫地的年代,也经历了市场大潮的冲击。陈寅恪诗云:“吾侪所学关天意。”这“天

---

① http://www.bookdao.com/book/1685834/

意”或可既指使命,又指时势。今天虽然说作为时代潮流的这“天意”难测,而未来也还有待于我们抱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去努力。① 但在孔子殁后两千四百九十六年之际,我们还是可以重温孔子之言,祈愿现代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能够保留中国传统人文之精神,保留读书的种子和光大传统文化的薪火,使之可以说:

>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来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 天之未丧斯文也,文不在兹乎?

Here is Millennium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He Huaih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 tradition of humanistic rationality which made“China become China”came into being at the turn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We may call it“the culture of the Zhou Dynasty”(周文), which was carried forward by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in the Han Dynasty. But it often advanced and developed in difficulties, with distress in accompaniment. It has met with greater challenges during modern times. Whether the spirit and cultural coherence of this tradition can still last and grow within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after the collapse of its suppor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remains a problem that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humanity, university, tradit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本文着重讲在困厄中传承文化,也是有鼓励这种使命之意。